

適當規管避免激進分子騎劫遊行

何子文

熱點熱話

本港近期有多場遊行獲警方發出「不反對通知書」，警方亦要求主辦方確保參加者掛號碼牌、手持指定物品或穿着指定服飾識別等，各場遊行最終都順利完成。然而，有反對派人士卻對有關安排上綱上线，發表「戴頸牌等同掛狗繩」等極端言論，這不但是公然顛倒是非黑白，更是肆意抹黑警方安排，挑動不明就裏的市民的憎恨情緒。

遊行是市民的權利，但任何權利都不是沒有限制，香港的遊行必須取得警方的「不反對通知書」，警方向主辦單位提出相關要求是法律賦予的權力，也是因應近年遊行屢遭激進分子騎劫而演變成暴亂所作出的針對性措施，目的不是針對遊行，相反是保障遊行，保障參與者以及市民安全。這樣正當的安排竟然被指責是「掛狗繩」，這究竟是反應過激，還是作賊心虛、心中有鬼？相信這些人心知肚明。

市民遊行集會權利得到保障

就着警方安排，保安局局長鄧炳強亦表示，警方是根據風險評估而採取措施以辨識參與人士，將人數控制在安全範圍內，避免有人騎劫活動，作出危害社會安全的行為。確實，雖然修例風波引發的暴亂已被遏止，但樹欲靜而風不息，有部分轉入「地下」的反中亂港之徒仍蠢蠢欲動，死抱仇視對抗心態伺機作亂，企圖危害公共安全。因此，警

方採取必要的管理措施，要求遊行人士佩戴或手持標識物，遵守相關法律，目的是防範有人滲透遊行隊伍製造混亂，維護本港得來不易的社會安定局面，根本無可厚非。

而且，疫後警方已經向多場遊行發出「不反對通知書」，早前有將軍澳居民舉行遊行，上週日更有十多場遊行同時進行，當中涉及不同的議題，有關於宗教，也有就着各種議題反映意見，當中不乏對政府一些政策作出批評，有關遊行申請全數獲批，並且得到警方的全面配合，令遊行在和平、有序之下進行，充分反映特區政府對市民遊行、言論自由權利的尊重。一些別有用心者以及西方媒體近年不斷抹黑港人的遊行、集會權利被剝奪，這些抹黑和謊言已是不攻自破。

但同時，市民的遊行權利得到充分尊重和保障，社會的秩序和安全同樣必須正視。雖然「黑暴」已經遠去，但極端分子仍然是死心不息，不斷尋求擾局機會。早前法院玻璃窗疑被極端分子射破，一些極端群組近期亦開始動員暴徒藉各種遊行發難，圖謀再次發動暴亂。對於這些威脅香港治安的風險，警方理所當然要作出應對。2019年「黑暴」之所以造成社會巨大的破壞，原因就是極端分子利用各種大型遊行作掩護，混入其中以人群為「護盾」，在地區上製造騷亂，而一些反對派的政黨及組織，更公然擔當其「幫兇」，每周都策動大量的遊行，為極端分子施暴作掩護，最終引發社會混亂，一發不可

收拾。殷鑒不遠，如果對於各種遊行沒有任何規管，沒有任何限制，就如2019年一樣，結果只會引來一班極端分子再次借機發難，騎劫遊行發動暴亂，這樣的風險絕對存在。

依法管制遊行有利社會安定

警方要求遊行參與者掛牌，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分辨哪些是真正的參與者，哪些是途中混入的極端分子，並且通過各種辨識措施令極端分子不敢發難。同時，要求主辦方必須全面配合，並且要為各種非法行動承擔刑責，也不是要嚇怕組織者，而是要他們知道責任，更是要杜絕反對派的政治組織再次掛羊頭賣狗肉，在香港社會煽風點火。

如果有人認為這些措施是不必要，然則，他們是否願意出來擔當，撤去這些措施遊行都可以在安全、和平、有序下進行？如果他們不能，就沒有資格出來指指點點。而且，根據《刑事罪行條例》，任何人作出、企圖作出、準備作出或與他人串謀作出煽動意圖的作為，引起憎恨或藐視香港特區政府，都屬於「煽動罪」。這些人借題發揮，對警方措施肆意抹黑，目的顯然是煽動市民對警方以及政府的憎恨，執法當局不能容許這些煽動言論散播下去。

要維護當前來之不易的安定局面，靠的不是退讓、妥協，而是依法辦事，果斷執法，讓香港可以排除政爭干擾，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時評

檢視人力供求 實事求是引援

各行各業請人困難，短缺不限高端人才，也包括了基層崗位。行政長官李家超昨表示，留意到不同界別人力均有欠缺，正研究實際情況並盡快公布整體應對策略。從餐飲零售，到幼兒和長者服務，市民都深刻體會了人力供應不應所帶來的問題；倘不正視和及時處理，尤其問題已牽涉醫護以至建造、運輸等領域，結果不單會窒礙經濟發展，民生最終也必然受損。

較諸2018年勞動人口一度超過400萬，最新數字僅為376.6萬，勞動參與率從約61%降至57.9%；在失業率低至3.3%即近乎全民就業的水平，市場出現招聘困難不難理解。新冠疫情無疑是推手，無法正常通關既令非本地人士難以來港，不少派駐人員也索性離港返鄉。統計處人口普查專題便指，2021年的15至34歲非本地出生人口較五年前大減6.68萬，這正是期內勞動人口減少的最主要年齡群。疫下經濟環境欠佳，也令學生延遲投入職場，其勞動參與率便由之前近40%暴跌至31.4%，加上更根本原因是，香港出生人數愈來愈少，早前已構成本地人口縮減壓力，影響並開始在勞動市場浮現，如1999年至2008年（即今15至24歲）的累計出生人數，便較前一個十年銳減22萬之多。儘管最新60歲以上長者的勞動參與率有所上升，所涉勞動人口亦增逾8萬人，卻仍彌補不了上述龐大的勞動力缺口。展望將來，鑒於三年疫情的出生人數再創新低，未來香港所面對的勞動短缺挑戰勢必更大，現在實應未雨綢繆。

除推動經濟加快復甦，創造條件讓青年重新如常就業外，疫後吸引人才來港，實是必由之路。特別是，刺激生育固然有利長遠提高人口，惟考慮到遠水難救近火，故在補充之餘尚宜爭取輸入更多外勞。當中，上調工資必然有助谷高勞動參與率，加強託兒護老等服務也有利婦女外出就業，但香港勞動參與率雖低於新加坡的70%，跟美歐普遍的60%其實相若，意味勞動參與率的推升空間有限。事實上，在出生及勞動人口減少、亦近全民就業的基礎上，加薪所能發揮的作用或非想像中大。

引入人才、輸入外勞，大前提是避免損及本地勞工權益。李家超強調，處理勞工短缺要平衡多方利益，當局有既定政策保障本地工人就業機會和收入，但若本地勞工沒足夠供應，通過本地培訓、簡化工序等也無法應付，便須出招確保人手供應足夠。在輸入人力時其工資不能低於行業入息中位數，正是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即確保政策並非為廉價外勞中門大開，同水平薪酬下本地打工仔的競爭力也有更大保障。有政黨昨建議三招應對，即先檢視不同行業的人力供求情況制訂「短缺清單」，再針對地為本地僱員提供培訓，最後才審視短缺情況輸入外勞，這樣不單可切實解決勞工短缺，還有確保本地打工仔優先受聘。

供應鏈要運作暢順，不單關乎貨物，更加關係人力；其斷裂後果，非但有礙經濟生產，成本上漲亦終轉嫁消費者身上。香港人口減少乃不爭事實，勢對經濟社會構成多方面影響，香港一方面須認清問題，另一方面須提早籌謀應對，制訂好短中長期政策。實事求是地加強引才，誠為不可排除之法。

香港商報評論員 李明生

青年收入現夾心陷阱不可輕視

黃遠康

有一說一

青年的發展向來是社會各界人士高度關注的議題之一，因此，特區政府每5年公布一次關於15至34歲本地青年人口的教育、收入、居住地點、婚姻狀況等方面的調查結果。而今次報告的結果，既讓人驚喜，亦令人擔憂。

驚喜的地方，就是過去10年不少青年的狀況都得到提升。例如曾經就讀專上課程的青年由2011年的46.5%，提升至2021年的62%；勞動人口比例從2011年的64.2%，上升至2021年67.9%；可以使用普通話及英語溝通交流的比例分別從2011年的65.7%及68.5%，增加至2021年的69.8%及80.4%；每月主要職業收入中位數亦由2011年的\$11000，上升至2021年的\$18500等等。

乍看之下，過去10年青年的入息中位數的升幅高達68.2%，較同期的通脹率高，意味着在職青年的生活質素應該有所改善。可是，仔細比較數據，便會發現青年的收入情況其實並非如此理想。筆者嘗試比較2021年，與經濟發展水平較為接近的2016年的數據，並且將青年的收入水平分成四個組別，分別是\$10000以下的低收入組、\$10000至\$25000的夾心組、\$25000至\$40000以下的中等收入組，以及\$40000或以上的高收入組。結果發現，低收入組在2016年的佔比為17.9%，2021年則是11.3%，跌幅超過6.5%；夾心組別方面，2016年的比例為62.5%，2021年則是58.4%，輕微下跌約4%；而中等收入組別，在2016年有12.8%，在2021年則增加至18.7%，增幅近6%；至於高收入組別，則由2016年的6.9%，上升至11.6%，增長4.7%。

單從數字上看，四個收入組別的變化的確是向好的，因為低收入的群組變小，而高收入人士的數量有所增加。不過，要

注意的是，夾心組別的變化其實不大。可以推算，就是過去5年期間，分別有約33%原本屬於低收入組別以及約25%原本屬於中等收入組別的青年，晉身為夾心組別及高收入僱員；至於原本屬於夾心組別的人士，在5年後打入中等收入行列的則大約僅為六分之一。

夾心階層向上流動機會不大

換言之，香港青年在收入上出現一種令人憂慮的現象，就是低收入人士和夾心階層的確存在上游的機會，可是兩個組別中的絕大部分人都未能脫離原本的階層。同時，中等及高收入人士的比例愈來愈高，而且收入提升的速度大於夾心階層，擴大這群社會精英與夾心打工仔在收入和生活方式上的差距。由於進入夾心階層後，就不容易再進一步，而且他們既沒有中產的優質生活，同時亦與絕大多數政府資助絕緣，概括而言，可以將這種現象稱之為「夾心陷阱」。

筆者相信，中、高收入人士的比例明顯增加，與青年的職業分布有直接關係。正如上述，2021年的青年人口整體教育水準相對較高，所以從事低技術、低收入工作的人口亦相對較少。以運輸、倉庫、郵政及速遞服務業，與住宿及膳食服務業為例，在2016年分別佔整體人數的7.5%及9.7%，而2021年則減少至6.2%及8.4%。相反，收入較高，同時需要較高學歷甚至專業資格的工作，則錄得顯著的升幅。根據報告內的職業分類，從事專業人員的青年比例由2016年的15.3%，上升至2021年的16.7%；而輔助專業人員，即護士、牙科助理、建築及工程技術員、小學及幼稚園校長和教師、統計助理、法律文員等文職僱員，更是從2016年的22.8%增加至2021年的27.5%，明顯高於全港人口從事相同職業類別的比例(20.8%)。

至於夾心階層向上流動機會不大，則可從青年接受專上教育的課程分布看出端倪。過去十年，就讀人數增長速度最快的課程，就是醫療衛生類，從2011年5%，增長至2021年的7.5%，增幅達50%，與上述輔助專業人員的增加，以致中、高收入人士比例上升的情況相合。至於另一升幅較大的課程種類，就是文科及社會科學，由2011年的17.2%上升至2021年的19.5%，意味着接近每5名專上院校學生，便有1名就讀相關學科。不幸的是，由於香港基本上沒有相關的產業，即是這些學科的畢業生在市場上難以尋找與技能匹配的優質崗位，自然在收入上變得「不上不下」。

基層子女缺乏精心教育規劃

雖然報告並未就青年的家庭背景及個人發展進行調查及對比，但可以想像得到，專業人士及輔助專業人員的增加，與90年代末、2000年初起愈來愈多中產家長高度關注子女的發展，提早展開生涯規劃，讓子女從小接觸不同課外活動、參加補習班、報讀名校、參與交流團等，以栽培成為未來社會精英有關。即使他們最終未必能夠成為醫生、律師、會計師等新興待遇及社會地位較高的專業人士，也可以退而求其次從事收入不俗的輔助專業人士，拉動整體青年的收入水平。反之，基層出身的子女在缺乏父母的精心規劃和足夠的教育資源下，則較難躋身中、高等收入階層，容易墮入難以抽身的「夾心陷阱」。

當中產出身的子女繼續成為中產，而基層、夾心的子女則不斷在所屬的階層中往復循環，貧富懸殊和跨代貧窮的問題自然一直惡化。雖然現屆政府特別重視青年工作，又推出《青年發展藍圖》讓年輕人有更好的發展機會，可是，如果不從階級角度看待青年發展問題，相信多數的青年都很难有所發展了。

政府須加強監管廉價團

資深地區工作者 何博浩

港事銳評

內地和香港恢復全面通關，直接刺激香港本地旅遊業的復蘇，對於冰封已久的酒店業及零售業也是一劑非常良好的強心針。參考香港旅遊發展局的公布數據，本年度2月初步訪港旅客數字為146萬人次，比起1月增加約2倍，也是2020年2月疫情至今按月訪港旅客首次突破百萬人次，回復至疫情前每月旅客量約三成水平。146萬人次的訪港旅客當中，內地客佔了當中的110萬人次，可見內地客對於香港旅遊業市場尤其重要。隨着運輸配套逐漸復甦，市場預期會愈來愈多內地客訪港。但近日不少傳媒報道，絕跡一時的內地廉價旅行團近日重臨土瓜灣及紅磡等地區，造成多處出現塞車情況，也有居民投訴噪音污染嚴重，部分公共設施亦被破壞，影響當區市民的日常生活。由於這些遊客通常都是集體出行，容易引致阻街的情況，加上遊客對於本港風俗文化未有深入了解，語言上亦有差異，容易產生文化上的誤解和衝突。

廉價旅行團以低團費招徠遊客，旅行社在設計行程當中，為了追求更高的利潤，往往將旅

行成本壓至最低點，於是就經常出現「公廁外吃杯麵」、「立食雙翅飯」、「過故宮門而不入」的情況。而且廉價旅行團帶遊客到土瓜灣區用餐，一來可以令到遊客不能夠到其他購物區消費，二來亦方便旅行社帶旅客到指定地點購物以賺取回佣。然而這樣會衍生多種問題，包括屢被詬病的「強迫購物消費」，以及為求賺到盡而出售劣質商品「以次充好」。通常參加這類超低價旅行團的遊客都是來也匆匆去也匆匆，事後也沒法追究責任；對於惡劣的旅遊體驗，遊客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以後不再到香港旅行及呼籲所有鄉親父老不要到香港「中伏」。由此可見，廉價旅行團無疑是殺雞取卵的慢性毒藥，香港的「好客之都」「亞洲最佳旅遊城市」各種美譽就一點一點被廉價旅行團侵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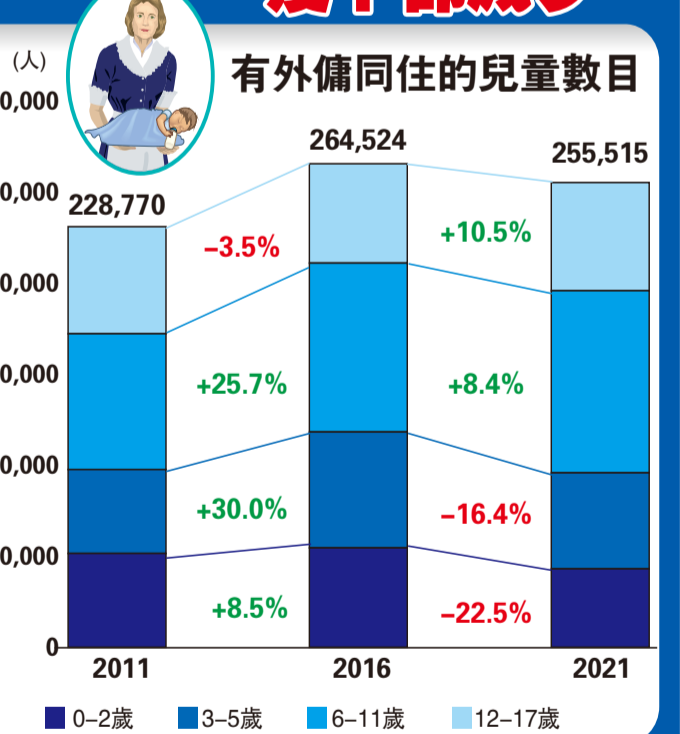
推動旅遊業多元化發展

特首李家超早前為了在後疫情時代重振經濟發展，大力推行「你好，香港！」宣傳活動計劃，計劃包括免費派發五十萬張機票的「迎客來」和邀請商界翹楚、政要、傳媒界和具影響力人士等到訪香港的「請客來」。既然政府

銳意讓遊客親身體會香港真實的一面，了解這個亞洲國際都會的最新發展、無限機遇和嶄新景點，讓遊客將真實的香港好故事帶回家中，就應該在公共行政方面積極主動作為。政府部門蒐集內地團的團費、行程等資料並訂立規管旅行團團費下限，嚴格審批及規管旅行團行程，同時亦可主動以「放蛇」方式嚴厲打擊零團費和導遊強迫旅客購物的行為。政府可以通過各種渠道加強對遊客的宣傳和教育，減少遊客及擬訪港人士「中伏」的機會，亦順帶讓遊客了解香港的風俗文化，提高遊客的文明素質，從而減少對當地社會治安和環境的影響，也可以加強對旅遊環境的保護和維護。

長遠而言，筆者建議政府可以加強對旅遊業的監管，推動旅遊業多元化發展，鼓勵旅遊業界提高服務質量和遊覽品質，研究將整個旅遊業轉型升級，開拓更多的旅遊市場，提高遊客的滿意度和旅遊體驗，從而吸引更多高端旅遊市場的遊客，減少對廉價旅行團的依賴性。例如旅發局可以設計更多本港綠色旅行路線及歷史古蹟旅行路線，也應提高郵輪碼頭的效率，為香港招攬更多郵輪客消費。

商報圖說 外傭湊孩增 疫下卻減少



有媽的孩子像個寶，有外傭的孩子更像寶；時至今日，聘用外傭照顧孩子，已不特別奢侈，既是愈來愈普遍，甚至是生兒育女的一個前提。

統計處的《二零二一年人口普查主題性報告：兒童》顯示，2021年有外傭同住的兒童數目超過25.5萬，佔所有兒童的26.5%，較十年前的21.4%明顯增加。

其中，年齡愈小的兒童，顯然愈需要外傭照顧；0至5歲的兒童多達30%與外傭同住，至於12至17歲的則只有18%。

然而，疫下無法如常通關，外傭無法如常來港，數據反映這恐是低生育率的一個推手。與2011年相比，2016年幾乎所有年齡層的兒童，其與外傭同住的人數均見上升。惟到2021年，整體增加趨勢卻見逆轉，0至2歲的與外傭同住人數更跌22.5%，3至5歲亦跌16.4%；反而步入中小學階段，有外傭同住兒童人數仍維持增長。以上所揭示的，乃原來聘有外傭的家庭繼續聘任，但疫情卻令剛迎小生命的家庭難以新聘外傭，甚或連帶生育意欲亦受拖累，即因供應阻滯而損及需求。事實上，2021年的0至2歲兒童總數，便較前一個五年大減20%至不足12.8萬。

加強照顧兒童服務，由增多託兒服務，到輸入更多外傭，甚至為傭工湊湊鬆綁或提供誘因，不單有利完善配套，減少市民養育壓力，且有助鼓勵生育推高整體出生率。